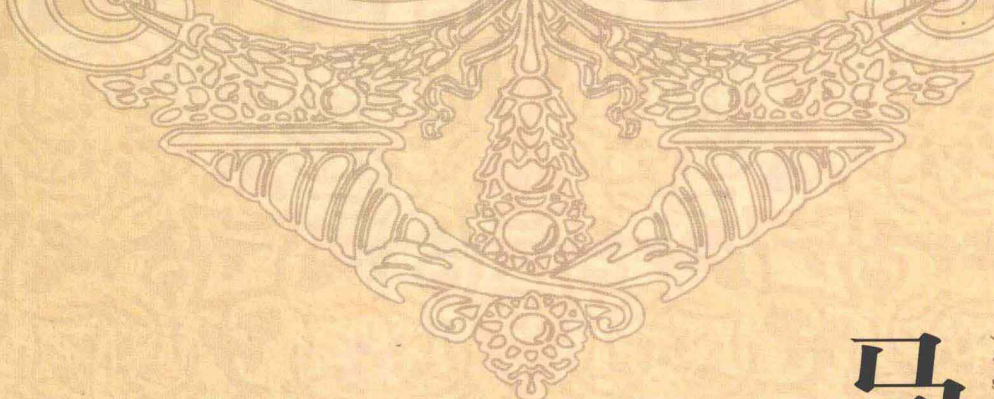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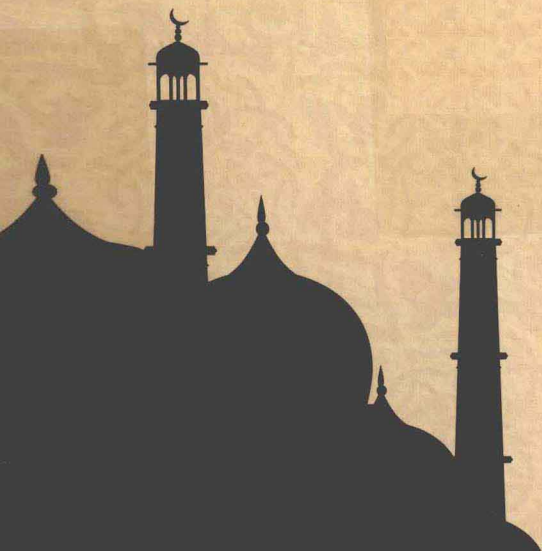
MAZHU SIXIANG YANJIU

马注思想研究

XU SHUIE
许淑杰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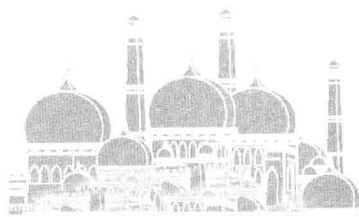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许淑杰 / 著

MAZHU SIXIANG YANJIU

马注思想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装帧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吴晓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注思想研究/许淑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609-8

I. ①马… II. ①许… III. ①马注(1640~1711)-伊斯兰教-思想评论
IV. ①B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7744 号

马注思想研究

MAZHU SIXIANG YANJIU

许淑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2609-8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近年来,“回回”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受到不少关注,学者们不仅研究这个来自域外的群体逐步转化为一个中国的民族集团的历史,也关心他们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处理伊斯兰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的路径、方法与目标。许淑杰 2003 年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颜世安教授和我的指导下,以“马注”及其思想为研究课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比较成功的再现、分析了这位明末清初的“回回”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地位。本书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明代是中国思想文化非常活跃的时期。但是一般主流学者只注意到佛、道、儒三个方面,最多加上这个时期有所传播的基督教。而正是在明代,先人来自西域的“回回”的中国化在不断深入。他们不仅讲汉语、穿华服、取汉名、用汉姓,而且他们的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用华夏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术语,向教内群体和教外大众阐述自己的信仰和思想。对于这个被称为“以儒诠经”的活动,当代儒学大家杜维明对刘智的一段评价对我们很有启发。杜先生说:“刘智的‘以儒诠经’(interpreting Islam in Confucian terms)有让儒士文人了解伊斯兰的目的,而这种方法的基础是两个共存的精神世界在宇宙观表现形式上的互补。刘智一方面试图将穆斯林地方知识中的智慧引入儒学的宇宙世界;另一方面也想让儒学世界熟悉‘真宰’(Heavenly Realm)的学说,以便汉人士大夫们能够欣赏‘至圣’(the Utmost Sage)对‘真一’(the Ultimate Reality)的可靠表述。他终身奉献的出发点是中国回儒之间相互启迪的对话关系,一方面是中国受

教育的穆斯林精英的自我认识;另一方面是文人儒士整体性的批判性觉悟。他的大的渴望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学术眼光思考和写作,学做一个受回儒两种思维模式启迪的人。”马注也是这样一位受回儒两种思维模式启迪的思想家。

青年时代的马注,在思想特征上展示的基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风貌;中年时期(30到49岁)希望能够以“正教”经世;后期20多年热心于宗教事务,反对“异端”,潜心向主,并专注于其作《清真指南》的修订辑补工作。在明末清初的四大“回回”思想家中,被看成“以儒诠经”第一人的王岱舆和著述丰富的刘智,往往受到比较多的学术关注,较晚的马德新不仅著述多,而且因为在清代政治中的独特地位而常被谈起。相比之下,对马注的关心则显得不够。许淑杰的著作考察了马注的生平历史和社会交往,梳理了马注的伊斯兰思想来源,特别是正统伊斯兰思想和神秘主义苏非思想,分析了马注《清真指南》对伊斯兰基本思想的阐述,论述了马注在伊斯兰思想史上的地位。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围绕马注的主要著作《清真指南》对马注思想的分析,如《清真指南》中对伊斯兰六大信仰和五大功修,以及对性命道德、具体伦理等的阐述。并通过这些文本分析提出,虽然从表面上看,在早期的“以儒诠经”运动中马注的影响不如王岱舆和刘智,因此在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圈内,对马注的评价要略低于王刘二人;然而由于马注注重对教义、教理忠于原文的阐述,加之他在长期游历、访学活动中对自己著作的宣传,因此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实际影响上,尤其在对一般穆斯林群众的影响上,马注可能超出王岱舆、刘智,其作《清真指南》流传的范围可能也在王岱舆《正教真诠》之上;而马注的成功之处,还可能在于他的著作语言非常大众化。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分析中国传统思想对马注的影响,如对马注著作中道德性命和具体伦理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的分析。其结论是,“马注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均以伊斯兰教的最高信仰——真主为依归。但是在宗教伦理的形式下,马注的伦理思想的具体展开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式的”。当代研究者关注“以儒诠经”的定义,村田幸子教授提出的定义

是“Islamic Thought in Confucian Terms”,中文翻译可以是“儒家术语表述的伊斯兰思想”。许淑杰的研究是对村田幸子定义的回应。

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最怕的是一味赞扬,在对“以儒诠经”思想家的研究中也如此。许淑杰在研究中既充分肯定了这些“以儒诠经”的“回回”先贤对中华传统儒学的掌握,又仔细分析了他们在某些地方对儒学思想观念的不恰当理解和应用。比如,为了给伊斯兰教在中国文化中寻找信仰的源头与依据,马注将中国商周以来的“上帝”观念等同于伊斯兰教的“真主”,并构建起了从上古到春秋,由孔子到子思、孟子的尊天事主的道统;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修养论与“你认得自己便认得造化之真主”的圣谕相类比,作为伊斯兰教“认己”而达于“认主”,证己而证圣的认主学依据。这样的分析判断是否准确、到位,见仁见智;但探讨的精神值得提倡。

正如前引杜维明先生所说,这些“回回”先贤“终身奉献的出发点是中国回儒之间相互启迪的对话关系”。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主流思想家在历史上很少对这些回回先贤的努力有所回应。20世纪末,在杜维明先生的倡导和杨怀中先生等穆斯林学者的支持下,我多次在国内负责组织哈佛——燕京学社和南京大学联合宁夏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等召开“回儒对话”会议,许淑杰不仅积极参与了组织工作和学术对话,而且与中国回族学者建立起感情和学术联系。对研究对象的热爱和尊重,是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传统和特色。这样的传统和特色是许淑杰和所有元史研究室学子完成学业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资源。期盼许淑杰沿着这样的道路在研究上更上层楼!

华 涛

2013年1月20日于南京

目 录

绪 论	(1)
一、关于选题	(1)
二、研究史回顾	(4)
三、问题的提出	(7)
四、立论的角度	(9)
第一章 马注生活的时代及其思想的发展	(11)
第一节 马注生活的时代	(12)
一、晚明清初中国社会及中国“回回”伊斯兰教的状况 ...	(12)
二、晚明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与明清 之际中国回回伊斯兰思想文化的发展	(17)
三、晚明清初中国外来宗教之间的碰撞与争斗	(20)
第二节 马注思想的发展	(28)
一、马注早年的生活及其思想的转折	(30)
二、马注晚年对《清真指南》的辑补及对中国“回 回”穆斯林社会问题的关注	(49)
第二章 马注伊斯兰思想的来源	(65)
第一节 伊斯兰正统与苏非主义的影响	(65)
一、正统伊斯兰教的影响	(65)
二、苏非主义的影响	(68)
第二节 前辈及同时代中国穆斯林学者的影响	(71)
一、马注对前辈中国穆斯林学者思想的继承	(71)

二、同时代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对马注伊斯兰思想形成的影响	(75)
三、经堂教育对马注伊斯兰思想形成的影响	(90)
第三章 《清真指南》与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	(92)
第一节 《清真指南》中对伊斯兰教六大信仰的阐释	(93)
第二节 多重文化特色的伊斯兰功修思想	(105)
一、马注论五功	(106)
二、内外兼重的功修思想	(119)
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伊斯兰伦理思想	(124)
一、马注论道德性命	(126)
二、马注论伦理道德	(133)
第四节 变通的宗教发展观	(139)
一、因教	(141)
二、主张回儒互补,提倡回儒兼修	(144)
三、提出打破祖习,整肃风俗	(146)
四、主张学教并重	(148)
第四章 中国回回伊斯兰思想史中的马注	(153)
第一节 马注学术地位的历史考察	(154)
一、回回穆斯林学人对王岱舆及其著作的认识及评价	(154)
二、教内外学人对刘智及其著作的认识及评价	(158)
三、回回穆斯林学人对马注及其著作的认识及评价	(164)
第二节 马注在中国回回伊斯兰思想史中的影响	(173)
一、马注对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的影响	(174)
二、马注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影响	(187)
三、马注思想的局限	(196)
结 语	(201)
附录一 术语表	(206)

附录二 马注生平简谱	(208)
附录三 讨白	(212)
附录四 诚律十条	(215)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40)

绪 论

一、关于选题

到 17 世纪前后,即大约在中国的明代末期和清前期,在中国穆斯林相对封闭的宗教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具有勃勃生气、思想深邃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宗教学者以“以儒诠经(以儒诠回)”的创作形式,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汉文著述,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精神生活,马注(1640—约 1711)就是这些贡献巨大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重要代表。在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以儒诠经(以儒诠回)”运动中,马注上承王岱舆,下启刘智,将“以儒诠经(以儒诠回)”这一译著形式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与王岱舆、刘智以及后来的马德新一起被并誉为明清四大伊斯兰汉文译著家。在其作《清真指南》中,马注明确指出了当时穆斯林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详细记述了 18 世纪初发生于云南的“革烂得”教案的具体情况,即发展了王岱舆以来经学撰述的译述范围^①,同时也留下了对云南回回民族穆斯林社团宗教生活的最早记录。在译著中,马注重视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教理进行忠实于原文的解释,注重对伊斯兰教基本宗教知识的介绍,加之在数十年的游历讲学活动中,马注对其作《清真指南》的宣传以及对宗教事务的关心,乃至积极参与,

^①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卷三十五,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 页。

所以在对中国回回穆斯林的 actual 影响方面,尤其在对一般的穆斯林群众的影响上,马注可能超出王岱舆、刘智等人,其作《清真指南》的流传范围之广可能也在王岱舆的《正教真诠》之上。另外,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上,马注以超越民族主义、卫教主义的立场,明确提出“回儒互补”思想,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指出了适合的道路。因此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马注占有重要的地位,对马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宗教界、比较文化学界、人文学界频繁展开了有关文化、文明间对话的讨论,到 1990 年代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后,文明对话、宗教对话进一步成为众多学者和有识之士关注的主题,2001 年还被联合国定为人类“文明对话年”。在文明对话的语境下,中国的伊斯兰教文化,尤其兴起于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以儒诠回)”运动,作为早期文明对话的代表,既为当前的文明对话提供了一个活的范本,同时也搭建起了世界三大主要文明——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对话之外的“第四座桥”,为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交流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点及可供借鉴的文本资源。马注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基于此,对马注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回回思想家在努力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历来不受重视。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以官方哲学的身份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佛教自汉传入,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到唐代,经过约 800 年的发展,禅宗的出现表明了佛教中国化的完成;而道教原本就是中国的本土文化。因此,自汉迄南北朝,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一般认为是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两翼的文化架构;到隋唐,伴随佛教中国化的完成,道教的发展,出现儒、释、道三教鼎立格局;至宋明,儒、释、道三教则完全走向合流。三教之外,虽然从唐代开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相继来到中国,但是,宋以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如同早期的佛教一样,都是活动于中国本土文化汪洋大海边缘的外来宗教,没有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内容。明清之际,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在宗教改革和西方殖民扩张的推动

下,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基督教再次入华,并且由于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以及近代科学文化背景等,再次入华的基督教在一段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及主流文化的局部认同,因此,17世纪到18世纪前期,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迅速,一度出现“孔子、佛陀、老子和基督合一”的“四教合一”之说。^①而伊斯兰教,虽然早在唐代既已传入中国,到元代更是“回回遍天下”,到明代进一步形成固定信仰群体——回回民族,但是却一直处于中国主流文化之外。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伊斯兰教自身的原因,但也不排除主流文化的滞障。

中华文化自先秦以来,虽然肇造于孔子的“有教无类”文化口号所显示的文化普济主义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与亲和力,但是也不能否认,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高度发达的汉文化也“使汉人群体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10世纪以后非汉民族群体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也“使汉人群体过早地培养了强烈的类似民族主义的情感和排斥异己文化的倾向”。^②另外,“有教无类”的文化普济主义口号之下的“用夏变夷”,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夷要变夏”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这些都直接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文化群体对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排斥,甚至歧视,其结果是,造成大多数主流学者对中国非汉民族敏感性的缺乏。这些缘于主流文化的滞障都是促成中国伊斯兰文化一直处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境地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实际上,中华文化自古就是多元来源,本质上,中华文明就是“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③论之后,中华文化的

① [意]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② 华涛:《文明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中的障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45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多元综合”也日益得到认同,并且在费孝通先生、张岱年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综合创新主线论”^①。在这一“多元文化综合创新”的中华文化架构下,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事实上,伊斯兰教来到中国后,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最迟在明朝末期回回民族形成后,就已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很多问题促使我认识到,17世纪以前讲中国传统是儒、释、道三教,到了17世纪有人称为四教,其实在17世纪的时候,中国应该是五教,三教外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因为那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传播了大概有上千年。”^②正是站在这一传统文化反思的意义上,本研究希望打破旧的文化界限,将马注研究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体系当中。

二、研究史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汉文伊斯兰译著方面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日渐深入,出现了一批专文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金宜久著《中国伊斯兰探秘—刘智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和美国学者村田幸子著《苏菲之光的中国闪烁》(*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2000),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明末清初的著名汉文伊斯兰译著家的研究,尤其关于王岱舆、刘智以及马德新的研究成为焦点,与三人相关的专著论文不断涌现,比如:关于王岱舆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村田幸子的著作,还有孙振玉著《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刘智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金宜久的著作,还有沙宗平著《中国的天方学——刘智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关于马德新的著作也有两部,分别是孙振

① 王东:《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中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6页。

② [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40页。

玉著《马德新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桂萍著《马德新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由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组编的作为中国思想家丛书的《王岱舆评传》(孙振玉著)也即将付梓。就论文而言,与王岱舆、刘智马、马德新三人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相对于王岱舆、刘智、马德新的火热研究状况,同为四大汉文译著家之一的马注,或许是因为材料的单薄,相关史料的匮乏,加之在汉文伊斯兰译著中的影响既不能与作为“汉文伊斯兰译著第一人”的王岱舆相提并论,也不比于著作等身的刘智,同时也不同于著作宏富、并参加了大量社会活动的马德新,因此其研究颇受冷落。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关于马注的研究,迄今没有专著,论文有如下几篇:马士年的《马注年谱》对马注的生平事迹做过较为详细的考证。^①已故穆斯林学者白寿彝先生曾经撰文《马注》对马注生平做过介绍。^②龚友德《〈清真指南〉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马注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思想做了探讨,提出,在以“伊斯兰教义与儒家伦理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之基础上,马注将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与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学说相融通,系统地“阐述了认主与忠君、孝亲、顺夫、友兄、信友、尊师、济世等的相融相通的关系,把儒家世俗的人伦规范纳入伊斯兰教的道德信条之中,也把伊斯兰教的道德戒律引入儒家世俗的伦理规范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中国伊斯兰教道德规范体系”。^③另外,梁向明《略论马注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观》一文也对马注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思想做了探讨,^④但其内容基本是对龚友德《〈清真指南〉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一文内容的重复。

近来,又有沙宗平《“不计人我,但论同异”——明清之际穆斯林学者王岱舆、马注的回儒对话探析》^⑤以及马经《文明对话的一座历史丰

① 马士年:《马注年谱》,《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第85—106页。

② 白寿彝:《马注》,《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1期,第2—3页。

③ 肖万源主编:《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211页。

④ 梁向明:《略论马注的伊斯兰伦理道德观》,《中国回族研究论集》(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8页。

⑤ “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昆明,2006年。

碑——马注与《清真指南》^①二文，从文明对话的角度对马注及其著作给予肯定。

其他与马注相关的、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

王建平《论十八世纪初的云南格兰岱教案》一文，对马注晚年所极力反对的“革兰得”教派做了详细考证，认为它“可能是中亚苏非神秘主义和印度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檀萃派的结合”，到中国后又吸收了中国道教和佛教的某些文化因素从而形成的一种有地方化特色的苏非主义。^②

此外，只有一些相关著作对马注有零星涉及，如刘天明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史》一书，对马注伊斯兰经济思想有所论及，认为“马注在《清真指南》一书中不仅介绍了有关天课、施济、饮食等方面的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教法教律内容，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加以阐发，而且宣扬了伊斯兰教‘信前定’思想”。^③

综合已有的关于马注的研究，成果可谓寥寥无几，且已有成果基本都是对马注思想及其活动等的初步的、外围的考察。虽然龚友德《〈清真指南〉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一文对马注的伊斯兰伦理道德思想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但是他提出马注“试图调和宗教与道德的界限，走出一条伊斯兰教义世俗道德化和世俗道德伊斯兰教义化的道路”^④，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可斟酌之处。

实际上，马注是我们提及明末清初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时不可回避的、重要的回族穆斯林思想家，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显然对于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这种研究状况，与其地位是不相称的。因此对马注及其思想进行细部研究大有裨益，既是对学术空白的填补，同时也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必不

① “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昆明，2006年。

② 王建平：《论十八世纪初的云南格兰岱教案》，《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第89—99页。

③ 刘天明：《伊斯兰经济思想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292页。

④ 肖万源主编：《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8页。

可少的内容。

三、问题的提出

任何外来文化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发展都面临着本土化或叫“本地化”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亦是如此。绵绵数千年的文化进程中,足具开放性的儒家文明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众多的外来文化,如佛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聂思脱里派)、伊斯兰教、印度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或拜火教)、犹太教、摩尼教,等等,而这些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也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的问题,即怎样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问题,或者说怎样对待本土化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外来文化,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不同程度的流传,并且有些文化由于得到封建统治者的优遇,还曾盛极一时,比如唐代的景教。但是,有些文化最终却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销声匿迹,比如盛极一时的景教,最终却退出中国,而有些文化,如伊斯兰教、佛教,却在中国最终延续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伊斯兰教、佛教最终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地化,而景教则反之。因此,在外来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本地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能否实现本地化也决定了外来文化最终的存在状态。

一般认为,本地化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转变或者再造原有的文化;再者也可能被原有的文化所消解。^①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佛教的中国化就是第一种可能的表现,而摩尼教中国化为明教就是后一种可能的证明。然而就中国的外来文化本地化的实际情况来说,伊斯兰教的本地化实际上创造了上述外来文化本地化两种可能之外的第三种模式。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地化,既没有转变或者再造中国原有的文化,也没有被中国文化所融合、消解,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立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

^① [比]钟鸣旦:《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陈宽薇译,光启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转引自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宗教》2003年第3期,第93页。

之外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一个特例。那么,在伊斯兰教文化本地化过程中,伊斯兰教是如何即保持自己的信仰,又与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保持和谐的呢?伊斯兰教是如何看待与之相异质的中国本土文化的呢?而“华夷之辨”的种族文化论下,中国主流文化又是如何看待这一不能被“教化”的外来文化的呢?

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兴起于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以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为代表的译著家们采取“以儒诠经(以儒诠回)”的方式阐释了伊斯兰教思想,从而建构起了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汉文译著运动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有凿山开石之功绩”^①;还有人将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期誉为“中国回回史上之文艺复兴时期”^②。同时,又由于“以儒诠经(以儒诠回)”运动作为早期文明对话的代表形式,为当前的文明对话提供了一个活的范本及可供借鉴的文本资源,因此在当前的文明对话中,明清时期中国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也被高度重视。

然而,考察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实际上汉文译著(中国伊斯兰文化界统称“汉克塔卜”)仅仅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的精英化的一种形式,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过程中,还有经堂教育以及以小经(又称“小儿锦”、“消经”、“狭经”等,是以阿拉伯文字母拼写汉语词语的汉语拼音文字)撰写的伊斯兰教经典在穆斯林大众伊斯兰信仰的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并不是统一的。就汉文译著运动而言,在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汉学派内部,也是分成不同派别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参差不齐,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进言之,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持怎样的态度;明清时期

① 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② [日]桑田六郎:《明末清初之回儒》,安幕陶译,原载《月华》第9期第14卷(1942)。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584页转录。